

上海6000年 第169-6期

一脉相承的开放传统也是文化自信的传统

叶舟凌利中熊月之解析：回望徐光启、王圻至晚清冯桂芬，上海文化如何传承



▲叶舟主持，与凌利中、熊月之进一步探讨文明的民本思想与创新开放

整理 李念 杨颖 摄影 周文强 版式 李洁

嘉宾对话

总结的时代：传统与外来文化的结合

叶舟：清朝著名诗人吴伟业曾来华漕，看王圻留下的梅花，看他出版的那些书，写下“平生贪著述，零落意如何”诗句。结合之前写《王圻传》体悟，我认为，到了王圻、陈继儒所处的晚明，是整个中国传统社会的发展成熟期，无论是传统文化、传统思想、传统技术都到了一个总结的时代，而此时又有一些域外的新知识、新思想的传入。如何总结原来传统文化的思维，又纳入新思想？正是当时那些士人们所怀有的一个历史使命，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之下，才会产生王圻、陈继儒、徐光启这样的典型人物。

身处历史进程中，王圻等著催生《农政全书》等

这些总结性的人物大部分来自哪里？来自上海。像陆楫的《古今说海》、张之象的《唐诗类苑》，包括王圻的《三才图会》《穉史汇编》，像陈继儒《宝颜堂秘笈》，催生了后面影响非常深远的两部书——徐光启的《农政全书》和陈子龙的《皇明经世文编》。王圻、陈继儒、徐光启、陈子龙、董其昌，其实就是身处历史发展进程中，我们就应该在历史发展进程当中来看这些人。

中国的传统绘画在这个时期也正是总结时期，而负责承担总结历史使命的人，同样来自于上海，就是董其昌和陈继儒。请凌主任详解。

从南朝顾野王始积累书画文脉，至元末松江“聚天下势”

凌利中：提到上海艺术史上令人骄傲的董其昌，我办过一个现象级大展《丹青宝筏——董其昌书画艺术大展》，吸引了海内外众多学者前来观摩。在我看来，北宋以降，文人画兴起至今700年间，起到承上启下的人物就两三位。如说三人，第一是苏东坡，第二是赵孟頫，第三就是董其昌。如说二人，赵孟頫和董其昌。

董其昌影响身后400余年，左右了后面的画史。为什么这个创新点在上海这片土壤中能够产生？2021年，我从上海千年书画史的角度进行了梳理，从书画史角度来说，创新和传承有关。传承包括两方面，一是人文，一是书画鉴藏包括藏书。从人的角度来说，宋元衣冠南渡，大批江左名姓、望族世家、官宦世家与文坛盟主聚集于松江一带。就著述风气而言即有悠久的传统，比如公元六世纪末善丹青的

南朝顾野王的就著有《玉篇》，元代王默赴京编撰《金字释典》。书画著作上，有宋末元初的邓继编了第一部南宋画史《画继补遗》，元代曹昭的《格古要论》是第一部分文物鉴赏书，元代夏文彦所编的《图绘宝鉴》是书画史上第一部通史性质的书，再如明代陶宗仪的《画史会要》《辍耕录》等。

我在展览里也对上海的书画鉴藏史做了梳理。元代尤其是元末，上海地理位置十分特殊，当时黄浦江还没有今天的规模，也不像苏州、杭州那样是兵家必争之地，那些文人士大夫喜隐居于青浦、松江，奉贤包括闵行一带，像黄公望、杨维禛等等，他们有很多收藏，与江浙地区的人文往来亦十分密切。用文徵明的话来说，元末松江一带叫做“聚天下士”，对几百年后的董其昌来说，就生长在这片人文和鉴藏文化底蕴深厚的土壤上，他时常提到“吾乡先辈”，这种传统于晚明又形成一个高峰亦是顺理成章，这是纵向积累。

这里展示两幅画，第一幅是《淀湖送别图》，我称之为上海版的《富春山居图》，创作于1346年的元代。大家知道淀山湖因淀山而得名，比杭州西湖大10倍。这两座山非常写实，一座叫淀山，一座叫箕山，前者海拔12.8米，至今仍在，尚有元代两口古井。唐宋时，淀山湖在湖里面，宋元以后才变成陆地，山上建有大雄宝殿等建筑，一直以来是历代文人雅集之所。因此，这是一座由历代文学家、画家诗画描绘过的千年历史文化名山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许多元末文人也成为了董其昌口中常常提到的“吾乡先辈”，这幅画作非常重要。

另外一幅《尚友图》轴，是晚明士人的一个群体，包括嘉兴的李日华、项圣谟，松江的董其昌、陈继儒等，形象展示了当时上海文坛巨儒书画大家的真实面貌，非常珍贵。

晚明又达一高峰，董其昌从实践理论上超越前人

从横向来看，跟王圻几乎同时代的，居住于今打浦桥、肇嘉浜路一带的顾氏家族于著作出版方面的贡献一样突出，如顾从德编了第一部印谱——《集古印谱》。

明中叶，包括上海在内的收藏可以称为“四分天下”，即上海的“顾（从义）、陆（深）、张（应文）、何（良俊）”，其中顾氏家族收藏作品极为顶级，众所周知，乾隆皇帝在紫禁城藏有三件书法宝贝，专门筑室曰“三希堂”；藏有包括现藏大英博物馆的东晋顾恺之《女史箴图》卷在内的四件绘画珍品，筑室并命名为“四美具”。大家知道这“四美具”于500多年前收藏在谁家？就是跟王圻几乎是同时代的顾从义、顾从德家族，其家有林亭楼阁，有“玉泓馆”等景，文伯仁（文徵明侄孙）为顾氏园林专门画了一张十多米长的《南溪草堂图》卷（现藏故宫博物院）。顾家还翻刻了包含历代书画法103本420帖的《淳化阁帖》。

再如陆深和陆楫编《古今说海》，陆、顾都是亲戚，文化活动中潘中潘有我、我中有你；再如豫园主人潘恩、潘允端父子收藏了董源的《龙宿郊民图》轴等，彼时上海书画收藏之丰，影响了周边地区，比如文徵明、沈周等经常划着船从苏州到来上海顾家来看米芾的行书《蜀素帖》卷（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）。

晚明的董其昌，可以说是代表了一个时代，他站在了制高点，登高一呼，不仅从理论上，更从书画实践上超越了前人的高度。

晚明政治：黑暗打断了创新，士人另有希冀

叶舟：这个时代的画是总结的时代，也是一个创新的时期。但正如上一次讲座提到的，徐光启为我们打开了大门，但是这个大门很快就关上了。为什么会关上，我们当然要提到晚明的政治。

“晚明三大案”导致的政治黑暗、混乱打断了文化创新

王圻去世时是万历四十三年，公元1615年。这一年的农历夏五月发生了一个很奇特的案件，一个人突然闯到皇太子朱常洛所在的慈庆宫，打伤了一个宦官。这是晚明政治中非常重大的案件叫做“挺击案”。挺击案、红丸案、移宫案是“晚明三大案”，导致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晚明党争，加上万历年常不上朝，崇祯疑心作祟，还有宦官专权，导致晚明整个政治可以用两个词来形容，黑暗和混乱，所以不到30年的时间，1644年明朝就灭亡了。

这段历史对中国整个传统文化都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。樊树志先生的《晚明史》五卷本，建立在一个全新世界大变动格局之下来看晚明的历史，同时用笔很细，把整个晚明各个方面，包括政治、文化、经济、思想都描绘得非常生动。细读该书，会对这个时代及其背景所造成的影响有更加深入的认识。

在此基础上，我们重新来看王圻半隐，陈继儒是全隐，董其昌是潜隐。

熊月之：人们曾持续地讨论，明朝灭亡和以前灭亡有所不同。南宋灭亡以后，有那么多人跟着南宋皇帝跳海自杀，明朝怎么没有呢？很多权臣在朝廷上争的是自己的权力，而不是对国家和王朝的忠诚，因此也不会殉国。更重要的是王圻和陈继儒对方孝孺的案件都有自己的理解。所以对政治表示一定的距离是题中应有之意。

中断的晚明种子，在晚清近代重新被拣起来发芽

叶舟：正是政治局势的变化，特别是明清易代改变了中国传统文化很多的进程。今天我们觉得王圻和陈继儒是非常了不起的人，但是清代修《四库提要》时，馆臣对陈继儒和王圻多持一种不以为然的态度，背后就是清代和明代学术取向大不相同，两人所做的很多贡献，在这段时期就埋没在历史进程中。当然我们也不能说它是完全中断的，到了近代之后，它们作为一种种子，重新在新的土壤中发芽。

刚才熊老师提到陈子龙的《皇明经世文编》，后一轮编撰《经世文编》的热潮就在晚清，最初是贺长龄和“睁眼看世界第一人”的魏源，随后各种《经世文编》基本上都在上海刊印，比如上海人葛士澐以及主要活跃在上海的盛宣怀都是主要的编纂者。从这里开始，他们把之前的

传统重新拣起来，在一个特定土壤中重新让它发芽生根。其实绘画也是一样的，到了清初有一个绘画高峰，四王、“清六家”，之后有很长的停滞期，到了晚清，海派绘画又给了中国绘画重新的生命力，请凌老师再给我们介绍一下。

董其昌绘画雄心：提出“笔墨论”、昭示“笔性论”，影响400年

凌利中：董其昌很智慧，不卷入党争，他用大量的精力去嘉兴、无锡等处看私人收藏，在仕途上好像没有雄心，但是在艺术上有。如所周知，董其昌要跟赵孟頫在书画上媲美，要一比高低，而董其昌的超越是有一个过程的。

董其昌所处的明末画坛，面临并需解决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四大问题：一是反思吴门画派及其后续局限；二是总结浙派及其末流之失；三是需摆脱史无前例艺术商品化的巨大冲击；四是需从艺术史发展高度梳理前代画史，并寻求出超越的理论。

董其昌凭借其见识广泛以及博采众长的智慧超越前人，提出了“笔墨论”，昭示了“笔性论”，将画史做了梳理，提炼了著名的“南北宗论”。在这个理论框架下，之后清初六家也好、四高僧也好，几乎都在他的理论影响之下而有所成就，换言之，没有董其昌，也没有八大，包括近现代绘画和海派画派。

这张大家都拿到的《上海历代书画人文示意图》上，梳理了自北宋以来上海绘画史上有三大高峰，即元末明初、明末清初、清末民初。包含书画史在内的上海文化史，显示了其底蕴深厚、艺脉醇正、兼容并包、勇于创新的特色，绵延至今，其创新并非一蹴而就。

对今天的启发：求真实用，开放自信

叶舟：今天我们惊讶于王圻和陈继儒的著作成就，感动于他们的民本思想。今天读他们著作，都是用文言文所写，也许会感觉离我们很远。所以就会发问：他们对今天的我们有什么样的影响和借鉴意义呢？

我认为求真实用，以民为本。比如刚才熊老师提到陆楫，他其实有不少在当时看起来非常惊世骇俗的言论。

徐光启提出开放重要论、必要论、有益论

熊月之：明代上海地区之所以思想那么开放、文化那么发达，跟经济发展有直接关系。海运、棉、布、盐使得上海这个地方与市场紧密联系在一起，造成经济相当繁荣，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分工，市场分工越细，社会高度卷入，创新能力就越强，接着就带来了思想的创新。思想创新最突出的几点都是惊世骇俗的。

大家都提到了徐光启很了不起。徐光启指出了中国人不够重视形式逻辑；他还强调开放三要点——开放重要论、开放必要论、开放有益论；国家对外开放对国外有益处，对我们也有益处，互相都有益处，但不开放将造成很

多困难，沿海人民都渴望开放。

陆楫提出消费有益论，与海派文化有内在联系

与开放有关联的就是人们的消费观，提倡消费主义好不好？明代正德年以后，整个江南以苏州为中心，穿衣、吃饭、住房、建园林都崇尚好的、美的，各方面都要强调以人自己为中心，强调物质消费。对于这一反传统文化中的消费观，陆楫专门写文章，强调消费的优点。他说我们家乡并非特产之地，但人们都喜欢消费，如果大家都不去吃饭，餐厅里饭卖给谁，旅游的人不去坐船，划船的人就失业了，因此消费可以促进整个社会的就业。

这些消费观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，这样有系统认识的还是第一人。现在，无论是国内国外讲到中国经济思想史，无不讲到陆楫。陆楫这种观点与他的学识和眼光有关系。人们明白或者潜意识地把自己的内心的东西释放出来，很多人没有公开讲出来，但到晚明在各种场合会或明或暗地表现。放到近代来看，海派文化和这些都有内在关联。

冯桂芬的开放观点承自徐光启，体现文化自信传统

叶舟：熊老师提到另一点也非常重要，就是兼容并包，开拓创新，我觉得也是当时文化给我们的一些启示。熊老师曾经提过传统中国对外来文化有三种态度：全方位拥抱、全方位拒绝，建立在中国文化的本位基础上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学习。无论是徐光启、陈继儒和王圻，其实都是第三种选择的代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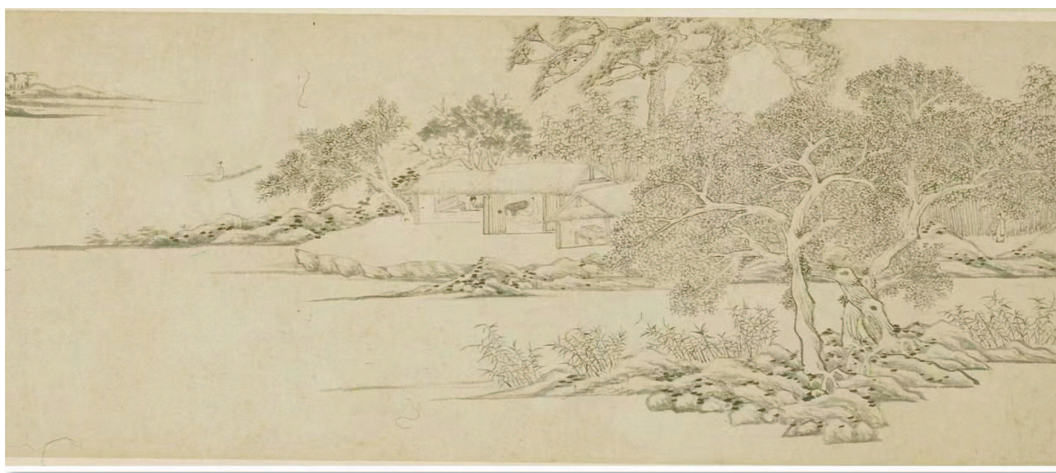
熊月之：徐光启时代天主教的西来与鸦片战争以后基督教传入有所不同，后者与坚船利炮相联系，而利玛窦时代是相对平等的中西方文化交流，中国没有被西方打败的耻辱，因此也没有过于看不起他们，双方处于平视状态。正因为这样，他们可以有选择地学习西方新知识。到了鸦片战争以后，因为人们受战败屈辱影响，往往忽略了即便战败了，我们也要细心鉴别西方文化的良莠。后来在上海表现得非常突出，现在可以清楚看到脉络是怎么传过来的。

在整个洋务运动过程中，在近代化过程中，最睿智或者最彻底的一个人是冯桂芬。1861年他写成《校邠庐抗议》，提出要办外语学校、要学习西方。他提出最有名的论点跟徐光启是一脉相承的：评判新事物，莫问其出处而只问好不好，好则无论来自何地都学习它，反之就弃之。冯桂芬这个观点在1861年提出出来，石破天惊。从王圻、陈继儒、徐光启再到冯桂芬，这是一脉相承的开放传统，也是一种文化自信的传统。

叶舟：从上海当时的江南文化到了近代的海派文化，也是一脉相承的。海派文化同样建立在江南文化或者上海传统文化本色的基础之上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我们重新看王圻、陈继儒、董其昌、徐光启，他们就是在上海这片文化沃土中结成的成果，他们共同组成上海文化最灿烂的星空。从他们身上，我们可以看到上海文化是从哪里来的，对未来又有什么借鉴的作用。



▲《淀湖送别图》局部 元 李升，上海博物馆馆藏，凌利中称之为上海版《富春山居图》



▲《曲水园图》局部 明 文嘉，上海博物馆馆藏，所绘场景为明代董宜阳（董其昌叔伯）别业（现闵行马桥镇友好村）。以上两幅画作均在上博东馆新开的“海上书画馆”首批展览中